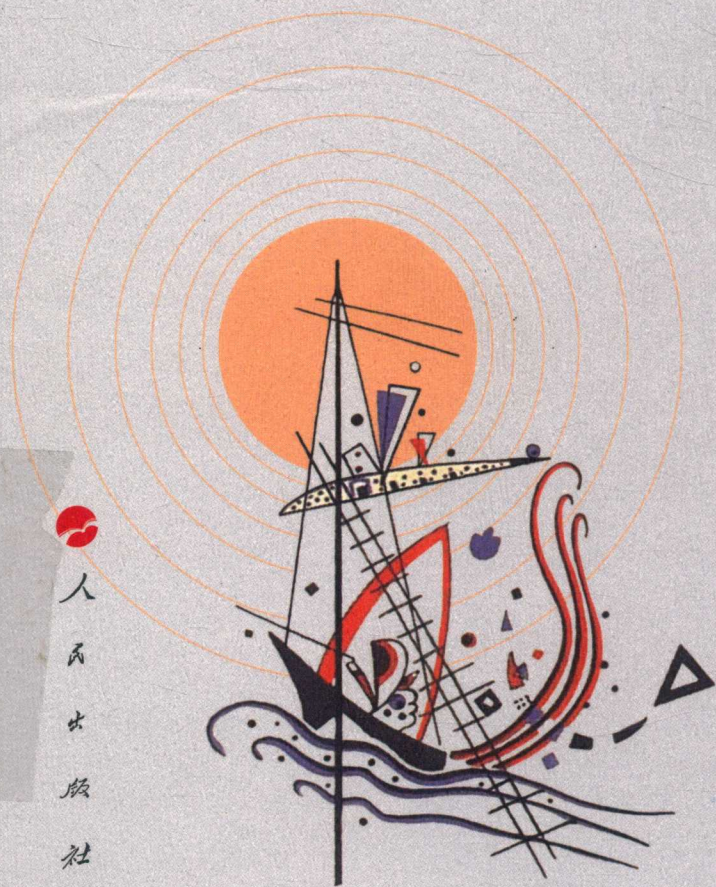


记忆的诗学

鲁迅文学中的母题书写

▲ 谭桂林 著



人民出版社

记忆的诗学

鲁迅文学中的母题书写

▲ 谭桂林 著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宰艳红

责任校对:白 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记忆的诗学:鲁迅文学中的母题书写/谭桂林 著. —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9.6

ISBN 978-7-01-020490-1

I. ①记… II. ①谭… III. ①鲁迅著作研究 IV. ①I210.9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041395 号

记忆的诗学

JIYI DE SHIXUE

——鲁迅文学中的母题书写

谭桂林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9 年 6 月第 1 版 2019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23.75

字数:310 千字

ISBN 978-7-01-020490-1 定价:78.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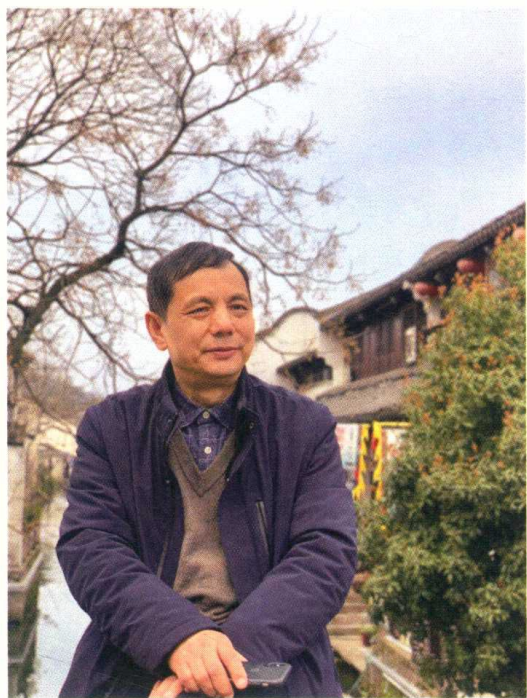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作者简介



谭桂林 湖南耒阳人，文学博士，现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曾入选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人事部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兼任中国鲁迅研究会副会长、江苏省鲁迅研究会会长等学术职务。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著有《20 世纪中国文学与佛学》《百年文学与宗教》《长篇小说与文化母题》《本土语境与西方资源——现代中西诗学关系研究》《现代中国佛教文学史稿》《唤醒人们的诗心——池田大作文学创作初论》等学术著作。

目 录

- 绪 论 母题、记忆与经典的产生 /001
- 一、时代话题的敏感者与创造者 /004
 - 二、母题意识本质的变与不变 /013
 - 三、原型以变体的形式重复出现 /020
- 第一章 启蒙：“铁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 /029
- 一、整体否定的启蒙策略 /031
 - 二、人性荒原的启蒙聚焦 /046
 - 三、言说启蒙与拷问启蒙的双声对话 /054
 - 四、启蒙话语的世纪变迁 /064
- 第二章 信仰：“恃意力以辟生路” /070
- 一、“伪士当去，迷信可存”的早年呐喊 /073
 - 二、“声发自心，朕归于我”的中年意兴 /087
 - 三、“诗人之死”与晚年鲁迅自我运命的认知 /102
- 第三章 漂泊：“那前面的声音叫我走” /124
- 一、“紧张令人觉得自己生命的力” /126

- 二、永在路上的文化异己者 / 132
- 三、“过客”家族的形象品质 / 141

第四章 革命：“改革最快的还是火与剑” / 148

- 一、“在动摇的革命中看见诗” / 149
- 二、“革命叙事”中的欲望与本能 / 159
- 三、“革命叙事”中的生命主义 / 171
- 四、“道德革命”抑或“人性革命” / 178

第五章 复仇：“生命的飞扬的极致的大欢喜” / 183

- 一、“自己裁判，自己执行”的人生哲学 / 185
- 二、先知向庸众的复仇 / 192
- 三、精神向肉体的复仇 / 202
- 四、复仇诗学的极致书写与双重解构 / 219

第六章 乡土：“惟独在记忆上，还有旧来的意味留存” / 229

- 一、先觉者寻根冲动的自我体认 / 230
- 二、民间信仰的独特诠释 / 237
- 三、乡土风景的时代发现 / 245

第七章 童年：“人之子”与“人之父”的双重觉醒 / 260

- 一、“以后是只要‘人’之父” / 262
- 二、题材的过去性与内容的自省性 / 268
- 三、自我人格精神的文化寻根 / 273
- 四、“童年的情形，便是将来的命运” / 278

第八章 疾病：独自咀嚼人我之间的渺茫悲苦 / 285

- 一、从胡须说到牙齿 / 287

- 二、疾病就是命运 / 296
- 三、外部剥夺与内部剥夺 / 303
- 四、疾病叙事中的生命伦理 / 313

第九章 鬼魂：“鬼而人、理而情”的生命狂欢 / 331

- 一、“鬼”文化的语义多样性与形态丰富性 / 334
- 二、投入和浸润在民间文化的狂欢中 / 342
- 三、生命深处的神秘喜悦 / 348
- 四、“革命者”是否“以鬼的方式现身” / 354

参考文献 / 365

后 记 / 371

绪论 母题、记忆与经典的产生

母题的概念最早来自于音乐，指的是一组或多组乐曲中一段不断重复的旋律。后来这个概念被引进到文学研究中，用来研究人类文学史上诸多精神现象，如乡土、都市、情爱、性、战争、复仇、友谊、成长、童年，等等。这些精神现象既是文学的永恒主题，但又不同于或者说在意义范畴上大于一部具体的文学作品的主题。通常而言，具体作品中的主题乃是作者通过一个故事或一连串的人物动作表现出的某种思想观念，体现作者对世界、对历史人生的认知与理解，而母题显然超越于具体事件和动作，它有时是一个永恒的精神命题，有时是一个人类心理情感领域内的基本概念。所以，歌德曾对文学母题做过一个经典性的定义，即母题是一种“人类过去不断重复，今后还会继续重复的精神现象”^①。母题成为一种学问，则是百余年来在科学技术的发达推动下学科交叉融合的结果。因为在物质生产愈来愈充裕、物质生产方式愈来愈精细的时代里，任何精神现象的发生、发展及其嬗变，都不再是一个简单的理念运动，在理念的背后深藏着时间、空间诸多层面的合力结构。母

① 转引自 [美] 乌尔利希·韦斯坦因：《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38 页。

题学的研究对象与方式方法，注定了它是一种交叉学科。将母题学引入文学领域来研究作家作品，是 20 世纪人类学学科发展影响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成果，是科技发达时代人文学科与其他学科发生交叉影响的一个例证。它必然地蕴含着多种学科的思维成果和智慧结晶，也势必要求研究者超越一般性的文本鉴赏的层面，进入作家记忆、民族原型、政治想象、历史无意识、叙事模式等层面，去发现、理解与诠释精神现象深层的合力结构。

曾有学者考证，“大约四分之三世纪前，顾颉刚先生在北大率先采用主题学方法，研究孟姜女故事传说。其后钱锺书先生作《管锥编》《谈艺录》，其中多有就某一文学主题前寻后绎，勾连中外之处。”^① 这些成果，当然可以说是母题的观念与方法应用于中国文学研究中的最初尝试。但真正从理论与方法上都自觉地将母题学引进中国文学研究领域，应该说是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的事情。伴随思想界的改革开放大潮，文学界的文化热和方法热大为流行，不仅母题的概念，而且母题学的理论与方法也开始进入现当代文学研究者的视野。在西方母题学知识与理论的介绍与翻译上，国内学界从 80 年代开始已经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像弗雷泽的《金枝》、普洛普的《民间故事形态学》等作品的译介，无论从母题学的理论范畴还是从母题学的方法使用，都对国内学术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为国内母题学学科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在实际的操作层面，母题学研究最早获得引人注目成就的是在古代文学与比较文学两个领域。古代文学学者王立从春恨、悲秋、出处（仕隐）、怀古、黍离、相思、思乡、惜时、游仙、生死十大主题，从柳、竹、雁、马、石、流水、海、黄昏、梦九大意象来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化的现象，为一向专注于考据与文献整理的古代文学研究开辟了一条新

① 吴相洲：《引起学术界关注的文学主题学研究——从王立教授的三本系列专著谈起》，《北京大学学报》2000 年第 2 期。

路。在比较文学领域内，乐黛云的《比较文学原理》用一章的篇幅专门探讨了主题学问题，从理论到实践两方面对“主题学”的原理与方法进行了深入的阐发。在中国比较文学主题学的理论建构与实践推广方面，台湾学者陈鹏翔是成就卓著的先行者之一。他在自己的博士学位论文《中英古典诗歌里的秋天：主题学研究》中，运用主题学的理论与方法研究中英诗歌里关于“秋天”的母题，是比较文学领域内较早的主题学研究实践。他的相关著述《主题学研究论文集》《主题学理论与实践》等，在大陆同行中也产生了比较重要的影响。80年代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一直就是新观念、新方法的实验场，对新观念与新方法的引进与运用最为敏感，也最为积极，母题学当然也不例外。1985年钱理群、黄子平、陈平原在关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三人谈中，提出“改造国民性”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总主题，已经隐含着母题研究的思路与方法。受到“20世纪中国文学”这一史观的影响，加之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的启示，近40年来，从母题学角度来评论现当代文学作品和研究现当代文学史的种种现象，在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已经出现不少高水平的成果。或许可以说，文学母题学的研究，已经成为改革开放以来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结盟取得的最为醒目也最为骄人的成果之一。

从母题学的角度进入鲁迅的文学世界，目前亦有不少的研究成果问世。譬如关于鲁迅文学中的复仇、乡土、鬼神、死亡等母题的研究，不时会有一些精彩的论文问世。不过综合看来，这些研究成果大多侧重在鲁迅文学母题与社会现实、时代精神、文化遗存的关联研究上。母题作为精神现象，是诸多因素合力形成，对母题的研究当然不能离开社会现实、时代精神与文化遗存等因素的考察，但本著的研究目标在于运用多种人文科学的研究方法尤其是心理学、叙事学等来考察和揭示鲁迅文学创作主体的内在机制，因而鲁迅生命中的个体记忆将成为诠释的中心。本著不仅对鲁迅在公众

生活中体现出的世界观念、政治立场、文化态度等显意识层面的主体因素进行广泛的考察，而且着力对鲁迅在私人生活和日常生活中隐含着的个体生命体验、情绪固结、心理阴影、精神创伤等潜意识或者无意识层面的主体因素进行深入的发掘。对鲁迅文学母题的研究，本质上乃是对鲁迅个体生命记忆的诗学诠释，因而这种研究能够更加有力更加贴近地说明鲁迅文学世界的独一无二特征。文学创作贵在独创，但文学母题却重在重复，只有不断地重复一种精神现象才能在文学史上出现某种母题现象。这种重复既包括主题观念，也包括母题范围内的意象营构方式和叙事机制等外在的形式因素。母题的重复是通过记忆来实现的，文学母题的发生不仅是一种作家个体的生命记忆，而且必然包含着作家个体的文学记忆。文学母题的重复当然不是复制，也不应止于模仿，它是体现出一种继承、转化与创造的全过程的重复，只有这样的重复才能创造出民族文学的经典，才能维系民族文学历史的绵远悠长，才能说明人类精神文化的薪火相传。所以，本著从个体记忆诠释的角度切入鲁迅文学的母题研究，目的不仅在深入地阐释鲁迅文学世界的创造性的资源由来，而且也要着力发掘在 20 世纪文学史的长河中，同型母题创作的作品怎样不断重复着鲁迅创造的意象、原型与叙事模式，从而精准地回答在 20 世纪中国新文学的发生与发展中，鲁迅的文学创作是如何成为经典，又是怎样发挥其经典作用的。

一、时代话题的敏感者与创造者

台湾学者陈鹏翔曾对主题学做过如下的界定：“主题学研究是比较文学的一个部门，它集中在对个别主题、母题，尤其是神话（广义）人物主题做追溯探原的工作，并对不同时代作家（包括无名氏作者）如何利用同一主题或母题来抒发积愆以及反映时代，做

深入的探讨”。^① 这一界定指明了母题研究在方法论意义上深入探讨不同时代作家反映其所处时代精神的重要性。确实，母题作为一种人类不断重复的精神现象，它是通过每一个时代的精神话题历史地呈现出来的。每一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时代的精神话题，正是这些体现着时代特色的精神话题的不断创生、积累、化合与升华，最终构成某个文学母题的意识本质和叙事模式。真正高明的母题书写者，往往就是自己时代的精神话题的敏感者和创造者。

鲁迅就是这样一位时代话题的敏感者和创造者。从文学类型来看，鲁迅的小说创作数量不多，但他的散文创作数量却相当丰富。这些散文中，有《朝花夕拾》《野草》之类的纯文学作品，即使在那些批评鲁迅文学成就不够者所诟病的杂文里，也有大量的叙事性与形象性都很强的文学类散文。他的小说创作既有现实题材，也有历史新编，还有神话传奇，他的散文创作既有社会政治的风云卷舒，也有个人身边琐事的追忆，而他的杂文创作则更是无话不谈，大到天下大事，历史掌故，小到草木虫鱼，书画碑帖，几乎尽揽其中。这些文学创作对现实生存的逼近性以及对社会文化的关注度，都显示出鲁迅是一个自觉感非常强烈的社会与文化批评家。鲁迅不是类型小说家，也不是学者型的社会评论家。鲁迅的文化创造力就在于他的生命能量的介入。王富仁说：“鲁迅本质上就不属于学院派知识分子，他之离开了学院而走进了上海的亭子间，是因为学院派关心的是历史而不是现实，是书本而不是人生，是学理而不是人的情感和意志。”^② 鲁迅自己也明确地表示过，他宁愿站在飞沙走石的沙漠之中，愤则大叫，乐则大笑，怒则大骂，也不愿进入艺术之宫中去吃上帝的黄油面包。正是这种社会与文化批判的自觉

① 陈鹏翔：《主题学研究论文集》，（台北）东大图书公司 1983 年版，第 5 页。

② 王富仁：《中国需要鲁迅》，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安徽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9 页。

性、责任感与决绝的态度，使得鲁迅对他所在时代的精神话题自始至终保持着一种高度的敏感与积极的介入。鲁迅的时代，正是中国新文学发生和成长的时代，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出现过的重要母题，都在这个时代孕育和滥觞，而这个时代的弄潮儿鲁迅，几乎以各种不同的方式为这些母题的创生和发展作出过自己的贡献。

鲁迅从事母题书写的态度与方式多种多样，对有些母题的涉足，鲁迅表现出非常自觉也非常持久的介入，譬如童年母题。鲁迅早在新文化运动开始之前，就曾经运用童年的视角写过一篇文言小说《怀旧》，如果说这篇小说通过一个儿童的眼睛折射出了辛亥革命给小乡镇士绅带来的惊慌失措，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童年母题创作，那么，20年代以后，鲁迅连续发表的小说《社戏》，散文《阿长与〈山海经〉》《五猖会》《风筝》《父亲的病》《琐记》《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等作品，已经构成了一个童年回忆的系列。同时，从在《新青年》写随感录开始，鲁迅在自己的杂文创作中也不断地谈论儿童问题，发表自己对童年人格、童年教育的独到意见。可以说，对儿童问题的写作兴趣与热切关注一直持续到了他在上海的晚年生活与创作。系列作品的形成显示了母题创作必要的条件即作品规模，而对儿童问题的具有系统性的思考则提供了母题创作的另一个条件即作品之间共同的精神联系，这些现象都说明鲁迅的童年母题创作不仅是有意为之，深度介入，而且向这一母题创作形态提供了自己的设计模式，注入了自己的精魂与心血。

在有的母题书写中，鲁迅似乎无心插柳，但由于他的生命体验的独特性以及他对这种独特性的深刻体认，有时偶一涉足柳也成荫，譬如情爱母题就是一个极好的例证。情爱乃是文学的永恒主题，古往今来的文学家几乎无不在这一母题上挥洒自己的才华，尤其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之后，“人的文学”“灵肉二元融合的文学”等观念的倡导，有力地促进了现代情爱母题文学的转型与发展。作为新文学运动的旗手鲁迅，虽然在杂文中对情爱问题发表过重要的意

见，也曾同其他新文学先驱者一道，为湖畔诗人们的稚嫩而大胆的情诗鼓掌欢呼，嘲讽“含泪的批评家”们的虚伪与道学。但他的小说创作、散文创作在这方面似乎是一个弱项，不写男女情事甚至成了有的人贬抑鲁迅文学才华的一个借口。不过，颇具玩味的是，鲁迅的小说《伤逝》、书信集《两地书》乃至散文诗《野草》等创作^①，虽然作者的创作意图并非专为男女情爱而发，但作者在这些作品中创造的某些情爱理念，如《伤逝》中子君“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简直就是五四时代青年爱情自由的最有力的表达，而涓生的“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也包含着那个时代里青年男女获取爱情自由之后却无路可走的无奈与辛酸。子君成了家庭主妇之后，喂油鸡，养阿随，一日三餐饭，酱醋油米盐，生活极其无聊，只有每晚逼着涓生回忆他向自己求爱的场景来获得短暂的心里感动，这种细节也显示着一种鲜明的现代意识，即获得了自由的爱也必须在日常生活中时时爱护、时时更新，对于五四时期觉醒过来并且争取到了自己恋爱的自由权利的年轻人而言，不啻是一种深刻而及时的思想警示。《死火》中营构的情爱意象“死火”，既联系着中国的文化传统，又体现着五四时期的现代观念，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不断复现的情爱原型。携带出谷，“我将烧完”，留在谷中，“我将冻灭”，这一情境的二难悖论，对于揭示历史中间物的情爱心理可谓别具一格，成为五四新文学情爱母题表现的经典范式。可以说，研究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情爱母题，往往离不开对鲁迅这些作品的关注与阐释。

五四新文学革命运动的发生，除了思想启蒙的目的之外，无疑还基于一个坚定的信念，这就是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胡

^① 李天明等学者认为整部《野草》表达的就是鲁迅与许广平的爱情主题，这无疑是对《野草》的主题过于狭窄化的理解，但《野草》中的某些篇什显然透露着鲁迅与许广平恋爱时的情绪与思考，这也无可否认。

适就多次强调新文学家要自铸新词，自造新句来抒胸中情，写眼前景。当然，文学是时代的文学，文学也是民族精神的映射，民族的精神始终随着民族物质文明的发展而发展，每一个时代中民族文化共同体都会面对一些不同以往任何时代的全新问题，文学对所处时代中某个全新问题的关注达到一定的规模，也就形成了这个时代一种新的母题现象。20世纪初期对中国而言，本来就是一个伟大的转折时代，是一个三千年来未有的大变局，且不说戊戌维新的失败、八国联军的侵略、封建王朝的崩溃、共和政制的建立这些惊天动地的大事接踵发生，即使西学东渐的迅速发力，也在这个时代给那些敏感的先进知识者以极大的心灵震撼与精神冲击，促使他们不仅在政治理念上，而且在伦理思想、文化传统乃至知识格局上面对和思考过去从来没有遇到过或者没有想到过的新问题。这种思考映射到文学上，就自然在新文学的思想体系中形成新的文学母题。在新文学运动的先驱者群体中，鲁迅可以说是最善于创造新鲜话题，也最善于捕捉社会与时代的敏感话题的文学家，无论切入到哪个话题的领域，他都能为这一话题带来具有鲜明独创性的思想、智慧以及表现形式。譬如现代文学中的童年母题，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由新的文学精神孕育而成的时代宁馨儿。因为中国的封建社会有着几千年的宗法家族体制的传承，在这种体制中儒家伦理观念以老者为本位、以祖先为崇拜对象，为了光宗耀祖，中国的家族传统具有普遍的望子成龙心理，所有的教育都指向功名利禄，而很少有人注意到儿童自身的心理特征与成长规律，从小就在这种道学传统培养起来的士大夫们也就不可避免地形成了难以克服的方巾气。这些依附于体制与文化的种种因素，共同封杀了中国文学观照和描写儿童生活的兴趣，造成了中国文学史上童年母题文学创作的匮乏。在现代新文学家中，最早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就是周氏兄弟。周作人在20年代就慨叹过外国有很多歌咏儿童生活的文学总集，而中国却无此类书物，所以他在学术活动上对童谣、民歌的整理曾经投入

了许多的精力。但最早在创作上开辟童年母题书写这块园地的则是鲁迅。他在 20 年代初期写的短篇小说《社戏》已经显露出童年母题叙事的某些基本特征，随后创作的一系列的散文作品，更是把这些基本特征予以明晰、定型与拓展。鲁迅的贡献不仅在于用童年叙事为中国现代文学提供了一种新鲜的题材，填补了中国文学传统中的一个缺项，而且在于他以自己的生命体验和深邃的思想，为现代童年母题文学在思想内容上建立起了国民性改造的现实批判品格、自我人格生成反思的寻根主题，在童年叙事方法上构建起了城乡对照、物人交感的基本模式。这些主题和模式，都是百年来中国童年母题书写一直沿袭下来的精神传统。

又如都会母题，这也是五四新文学运动发生后才出现的新文学母题。它的发生与发展，无疑与鲁迅大有关系。西方工业革命以后，几百年来科技的进步促成了工业的发展，工业的发展不仅吸引了大批劳动力集聚在都市，造成了都市在消费上的极度繁荣，而且现代工业的生产形态也使得都市劳动的分工越来越细致，越来越职业化，造成了都市人生活的单一与机械。都市的强势发展改变着西方人的生活习惯、思维方式乃至心理状态，这些改变反映在文学上，就造成了西方 19 世纪以来文学中的都市母题的发达。日本著名文学批评家厨川白村就曾经指出：“近代的欧洲文学就是都市文学，它并无十八世纪文学的那种优雅典丽高尚的气氛，而是意味着它的特质是以描写刺激强烈的都市生活为中心。”^① 中国的情况与西方大不一样，正如马克思指出的，“亚细亚的历史是城市与乡村无差别的统一”，^② 直到 19 世纪末，中国一直长期处于小农经济生产状态，都市与农村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都市和乡村只有一堵城墙隔

① [日] 厨川白村：《西洋近代文艺思潮》，陈晓南译，（台湾）志文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57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上，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480 页。

开，打开城门就是乡村，都市生活与乡村生活在生存状态上没有本质区别。所以中国古代有市井文化，但是没有真正的都市文化，有市井文学，也没有真正的都市文学。五四时期，现代诗人郭沫若等也曾讴歌过现代都市文明，如《笔立山头的展望》等，但那种诗歌的主题只是对科学精神的礼赞，无论是在现代都市人的生存困境的揭示方面，还是在描绘都市生活的美学品格以及作家在解剖现代都市生存的自觉性方面，这个时期都没有能够产生出真正的都市文学。最早感受到这个文学缺憾的是鲁迅，他在翻译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和《出了象牙之塔》等著作时，已经从厨川白村的研究中体会到了西方都市的发达带来的人类精神文化的变异情况。而在1926年时，他翻译了托洛茨基的《文学与革命》中的第三章《勃洛克论》，又为胡敦翻译的俄罗斯诗人勃洛克的《十二个》写了后记。鲁迅在翻译后记中一方面赞许勃洛克为俄国“现代都会诗人的第一人”，指出：“他之为都会诗人的特色，是在用空想，即诗底幻想的眼，照见都会中的日常生活，将那朦胧的印象，加以象征化。将精气吹入所描写的事象里，使它苏生；也就是在庸俗的生活里，尘嚣的市街中，发见诗歌底要素”，另一方面又不无遗憾地指出，“中国没有这样的都会诗人，我们有馆阁诗人，山林诗人，花月诗人，……没有都会诗人。”^①

这种遗憾当然不是即兴的、断片似的念头，而是一种已经相当成熟了的思想，它深深植根于对体现着“世纪末果汁”的西方近代文学史的了解，以及鲁迅长期身处其中的都市生活体验。自从鲁迅逃异地走异路开始救国救民道路的探寻，他的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南京、东京、北京、厦门、广州等多个城市中居住，都市生存环境对鲁迅的思想、性格乃至文化批判力的形成，无疑都有深刻的影

^① 鲁迅：《集外集拾遗·〈十二个〉后记》，《鲁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11页。